



云南科举趣谈

张佐 张俊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ISBN 978-7-5489-3492-9




9 787548 934929 >

定价：68.00元

云南科举趣谈

张佐 张俊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 (CIP) 数据

云南科举趣谈 / 张佐, 张俊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489-3492-9

I. ①云…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科举制度 - 研究 - 云南 - 明清时代 IV. ①D69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0031号

出版人: 李 维 刘大伟

责任编辑: 黄云松

装帧设计: 庞 宇

责任校对: 李远生 温德辉 吕 媛

云南科举趣谈

张佐 张俊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装: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9-3492-9

定 价: 68.00元

序 言

2013年我与田丕鸿先生合作，写作、出版了《云南科举史话》上、下册（该书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荣获云南省第十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2015年我又与耿嘉福先生合作，写作并即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科举家族》。两部书共一百二十多万字，写作的时间有三年多，我从事收集资料和研究的时间却长达三十年。

两部书的出版或即将出版，使我心力交瘁，却又意犹未尽。意犹未尽有五个原因：其一，手头掌握的有关科举的史料越来越丰富，爱不释手；其二，研究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独特的见解，想与对科举感兴趣的朋友共享和探讨；其三，《云南科举史话》出版后，接到许多读者朋友的赞许电话和鼓励电话，增强了我继续研究和写作的信心；其四，《云南科举史话》的出版和《云南科举家族》的即将出版，得到了云南美术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两部著作顺风顺水地出版或即将出版，使我萌生了写作《云南科举趣谈》的念头；其五，我撰写有关科举的著作的确有优势，因为我母亲的外祖父倪恩龄的家族是明清两代云南最大的科举家族，他们五代人中共有十一人先后考中进士，四人被选为翰林，倪恩龄是清光绪二年翰林和清末的清官，我自幼就听母亲讲过许多有关倪氏家族和科举的故事，可谓“家学渊源”。

2017年初，当我把写作《云南科举趣谈》的念头向云南美术出版社的刘大伟社长述说后，又得到了刘社长的鼓励和支持。我和胞兄张俊经过半年多的辛劳，《云南科举趣谈》终于完稿了，并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带学术性的著作出版困难的社会环境下，刘社长慧眼识珠，毅然决定出版《云南科举趣谈》，是需要超凡的眼力和魄力的。在此，特衷心感谢云南美术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及为该书圆满出版付出心血的责任编辑黄云松老师。

《云南科举史话》《云南科举家族》《云南科举趣谈》，既是一套展现和研究云南科举史的丛书，又是一套从特殊角度介绍和弘扬云南历史文化的丛书。如果说《云南科举史话》粗线条地勾勒了云南科举取士的历史，那么《云南科举趣谈》则细笔触地论述了云南科举人物的风采；如果说《云南科举家族》是一幅展现云南科举家族发展和兴盛、成功和辉煌的荣耀图，那么《云南科举趣谈》就是一面再现云南科举人物挫折与醒悟、失败与成功的青铜镜。因此，《云南科举趣谈》与前两部著作相比，更具有独创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云南科举趣谈》是一部研究与云南科举取士密切相关的人和事、史与籍的专著。该著作通过明清两个朝代云南生员、举子和贡士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的情况，分析了他们失败或成功的原因，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现象，有的人学问很好，知名度很高，却终身与举人、进士无缘分；有的人学问平平，名不见经传，却高中进士，甚至被点为状元。于是就有人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不公平、不公正、不科学，没有选拔到真正的人才。此说貌似有理，但持此说的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主要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特别不了解明清两代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笔者多年从事中国科举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科举出身的，特别是由举人、进士出身的大文人、大学者远远地多于非科举出身的大文人、大学者；著书立说与对付科举考试并取得功名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学问，这两种不同

层次的学问，在有的人身上有密切的联系，并能彼此促进；在有的人身上毫无联系，并被他们误认为彼此会有不利的影响；著书立说是大学问，大学问主要显示的是文化人创新的才学；对付科举考试并取得功名是小学问，小学问主要体现的是应试者学习的成绩；有的人既有大学问，又有小学问；有的人要么有大学问，没有小学问，有的人要么有小学问，没有大学问；有的人要么大学问、小学问全无。什么是大学问？容易了解，也容易取得共识，恕不细说。何谓小学问？笔者认为所谓小学问，指的是：对付科举考试并取得功名必须具备的一些知识以及相关的技能、技巧。具体地说，一个人要想在不同层次的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必须熟悉四书五经及朱熹对四书五经的诠释，必须熟练地掌握写作八股文的技能、技巧，必须了解“清真雅正”的取士标准（该标准虽然是清代正式提出的，但是在明代就已经按照这一还不成文的标准取士了），必须知道考场的各种规矩和作文时的各种要求和忌讳。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如果粗通小学问，就可以考取秀才；如果具备小学问，就可以考中举人；如果熟悉小学问，就可以考中第三甲进士，如果精通小学问，就可以考中第二甲或第一甲进士。

该著作又指出：“考生考试时，既需要有扎实的学问基础，还需要有灵活的临场发挥。因此，因考试成绩的优劣而导致的排名先后，有时带有偶然性，并不一定能显示出应试者的实际水平。更何况，成绩的一时优劣还可能有其他特殊原因。因此，一时的优劣，并不等于永久的优劣，优劣在自满松懈者与努力进取者之间，在能否认认真地总结和吸取经验与教训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乡试的第一名举人（解元），有可能会试落第；而乡试排名倒数第一的举人，也有可能试高中”。该著作还指出：八股文有以下优点：一、衡量一篇文章的好坏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科举考试时使用的八股文统一从四书五经的章句中命题，在形式上有四联八股的规范，内容上有代圣人立言必须符合“清真雅正”宗旨的要求，是中国考试史上的一

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二、使用八股文这一标准的考试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使用其他文体时的评价误差，可以使评卷更加标准化、客观化，并可以减少评卷的工作量；三、八股文是汇集了古代各种文章写作技巧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优秀文体（当然，八股文也有优劣之分），是一种很注重写作技巧的文体，是诗歌中的律诗。考试时使用这一文体，既可以检测应试者写作的技能、技巧，又降低了应试者侥幸取胜的概率。当然，用八股文取士有优点也有缺陷，你可以不喜爱八股文，甚至可以厌恶八股文，但不能说八股文没有价值，八股文扼杀了人才。

《云南科举趣谈》有以下特点：（一）研究和谈论的内容更深入细致，且特别注重研究和谈论其他著作没有涉及的内容；（二）研究的内容既有理论支撑，又有生动的实例佐证，具有可读性；（三）本书稿的篇目既独自成篇，又互有关联和补充，开篇谈论了与科举取士密切相关的文庙后，大体上按照乡试、会试、殿试、朝考的顺序组织相关的篇目和内容；（四）本书稿最大的特色是，透过错综复杂的一些历史现象，追寻其产生的原因。

由于《云南科举趣谈》是一部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其中的一些观点仅是我们个人的看法，读者朋友不一定完全赞同，不赞同没关系，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愿意与我们共同探讨，更欢迎；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或校对疏漏，书中的个别地方难免有错误，敬请方家指正！

刚写完这篇《序言》，才得知《云南科举家族》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了。

张 佐

2018年6月于昆明“学思斋”

目 录

云南文庙考辨	
——兼谈文庙的儒学传播和生员培养	1
著名学者方玉润为什么考不上举人	
——科举考试需要有专门的学问	10
何谓民间版的云南进士	17
诗人杨载彤乡试的艰难历程	24
志在必得的两位解元	30
荣耀过后的痛苦	
——解元落第	35
沮丧过后的荣光	
——末名举人高中进士	42
明嘉靖元年壬午科云贵乡试浅析	52
云南乡试中学历最高的主考官钱棨	63
林则徐与己卯科云南乡试	74
漫漫会试路，揪揪举人心	92
最有毅力的会试人	101
科场中最幸运的云南考生	106

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会试剖析·····	111
金榜上的云南少年有几人·····	120
距摘取状元桂冠只有一步之遥的云南进士 ——兼谈状元选拔的偶然性·····	144
从云南文进士的地区分布看富民县古代的教育·····	155
民国《姚安县志》中的谬误·····	169
明清的馆选与云南翰林·····	173
明清云南籍高官评点·····	185
云南五大科举家族·····	206
何桂清在“上海税则谈判”中的功绩·····	238
何桂清与曾国藩的恩怨与争斗·····	251
三不朽的陈荣昌·····	267
袁嘉谷与昆明状元楼·····	278
附录·····	286
参考文献·····	310

云南文庙考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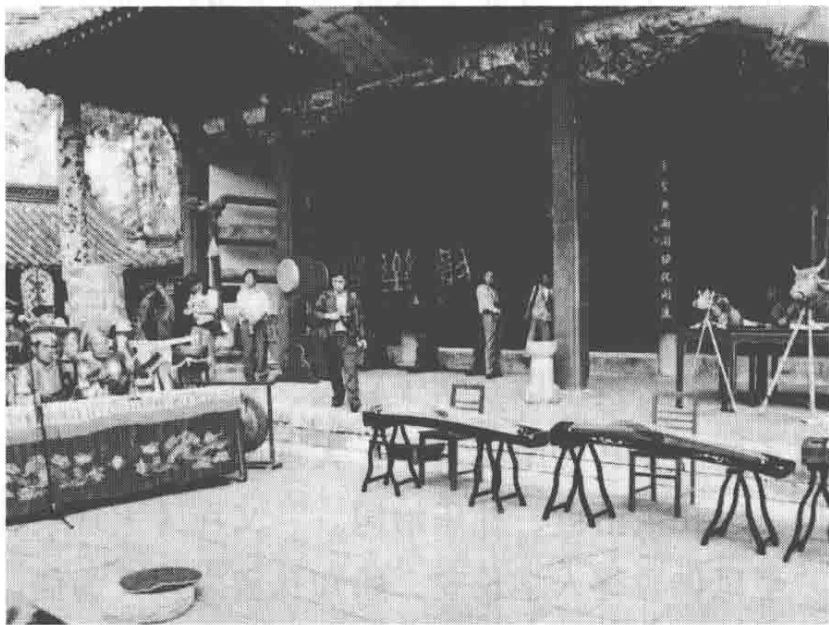
——兼谈文庙的儒学传播和生员培养

一、云南最早的文庙创建时间考

云南最早的文庙创建于哪个朝代？

云南的多数学者认为云南最早的文庙始建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而我们坚持认为，云南最早的文庙创建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至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年）之间，其理由有二。

其一是，贞观四年以后，云南的姚州等地始建文庙，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有必然性。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中央政府在今天楚雄州姚安设置姚州；唐高宗麟德元年



建水文庙祭孔

（664年），又设置姚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的管辖范围十分广大，大致包括今禄丰、武定、元谋一线以西，金沙江以南今楚雄和大理

一线以北，以及点苍山乃至澜沧江一线以东地带，也就是今楚雄州和大理州的大部分地区和丽江兰坪在内的广阔区域。到唐天宝九年（750年）南诏地方政权与中央交恶并攻占姚州之前，唐王朝至少在以姚州为中心的周边实际统治了129年。

《新唐书·礼乐志》^①记载，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曾“诏州、县皆作孔子庙”。这是一个凡大唐管辖的州县都必须严格执行的强硬政令。云南地处边陲，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对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及时执行，也不可能拒不执行，更何况在姚州等地建文庙祭祀孔子，既不损害地方官员的任何切身利益，又能提升他们在百姓中的形象和显扬他们的政绩，这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地方官员何乐而不为？因此我们认为贞观四年以后，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云南姚州等地便陆续开始建文庙祭祀孔子；遵照皇帝的命令在云南一些州县建文庙是既合情又合理的正常事，而违背皇帝的命令拒绝建文庙，才是令人百思不解的咄咄怪事。另外，在天宝九年以前，统治今大理地区的南诏地方政权是依赖中央政府并与唐王朝保持着亲善关系的南诏王，如晟罗皮、皮罗阁等人都亲唐尊孔。

明代初年的李浩在《三迤随笔》^②中记述了南诏国的许多历史与轶事。他在《韦安抚使与郑清平官》一文中云：“诏初诸王，世通盛唐，历受册封。蒙归义得铁卷金冠，赐以云南王位。诸诏王每入西京，必携诸臣及学子百人，入学礼义。学子入学三年，就学于国子监。”在《南诏入学，大理国沿之》一文中云：“南诏亦如中原，以孔孟治世，礼乐治国。”又在《大理祭孔考源》一文中云：

“至凤伽异等入学长安，始知孔孟之教义为儒。至开元长安京师始有祭孔科仪。带回典仪，立孔夫子神位，于八月二十七祭之。有祭曲二，异牟寻师郑清平，教乐人以礼，八佾入禁，三年一次。”如

① 宋·欧阳修、宋祁等纂：《新唐书·礼乐志》，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② 明·李浩著：《三迤随笔》，该著作收入大理州文联编《大理古佚书钞》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此亲唐尊孔的南诏统治者在国中建孔子庙也在情理之中。而后世的一些学者以唐代建文庙没有留下任何实物与遗址的理由来否定云南唐代始建文庙的事实，显然是十分荒谬的，这就像唐代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某人患了癌症，就认为唐代的人肯定不会患癌症一样的荒谬。

其二是，唐天宝九年（750年）以前，南诏地方政权在大理建文庙有文献记录。明嘉靖年间滇滇的状元、著名学者杨慎在《滇载记》^①中云：“晟罗皮（南诏王）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712年），立孔子庙于国中。”嘉靖年间昆明举人倪辂撰的《南诏野史》^②同样认为：开元十四年（726年）“南诏晟罗皮立文庙”。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羁縻·南诏始末》也载：“晟罗皮之立，当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庙于国中。”此外万历《大理府志》也载有“至蒙氏，晟罗皮立文庙于国中”。明代人诸葛元声成书于万历年间的《滇史》云：“玄宗开元三年（715年）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说：《唐书》记载：“先天元年，南诏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

云南现代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对赵翼的依据有疑问，他查阅了新、旧《唐书》，未发现南诏建孔子庙的记载，就在《云南史料丛刊·目录概说》第八卷《元时文物》中云：“按新、旧《唐书》无南诏建孔子庙之说……”并得出结论：“惟孔庙实始于元初置行省之时，为创举也。”我们则认为：新、旧《唐书》的版本较多，他查阅的那一种版本的新、旧《唐书》无南诏建孔子庙之说，并不意味着其他版本的新、旧《唐书》无南诏建孔子庙的记载；即使各

① 明·杨慎著《滇载记》，杨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旧本与《滇程记》合为一篇。

② 明·倪辂撰、杨升庵校本：《南诏野史》，云南省图书馆藏淡生堂钞本。

种版本的新、旧《唐书》都无南诏建孔子庙的记载，也不能证明，由唐王朝直接管辖的部分州县以及南诏在未与唐朝中央政权交恶之前从未建过孔子庙，因为新、旧《唐书》对边陲云南的史事遗漏很多，可谓不胜枚举。而其他史书和著述对新、旧《唐书》有关云南史事的补遗，也是有可靠史料为依据的，并非全是无稽之谈。

以上史料虽然在云南立文庙的时间上略有出入（一说712年，一说715年，一说726年），但应该说是出入不大的。有出入，正好说明这些文献记录是来自不同的史料，或者说明南诏统治者所建的文庙不仅仅是一座。

二、文庙与孔庙的分类及称谓辨

儒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所以历代科举考试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这离不开的“宗”就是儒家经典。儒学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上顺畅地传承、发展两千余年，与它的载体文庙（也称孔庙）分不开，这大大小小的文庙历史上自汉高祖刘邦开始祭祀孔子之后，文庙的建造逐渐从京城到边陲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网络，其功用也从祭祀孔子，逐渐扩大。

历史上文庙这一建筑之所以能建盖得如此之多、分布得如此之广，是因为它跟历代王朝尊孔、倡儒（文庙是传播儒学的官办学校）密不可分！

文庙的作用如此之大，可是至今其名称却颇为混乱，这种混乱广泛见于民间，如各地或称“文庙”，或称“孔庙”。文庙名称在民间的混乱尚情有可原，然而，笔者发现这一混乱现象还常常充斥在一些书籍中，甚至还出现在一些谈论文庙的论文和专著中，如同是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1986年版）中对“文庙”的叫法，就有“嘉定孔庙”“南京夫子庙”“苏州文庙”等名称。

这仅是一般书籍，在论文和专著中这样的混乱更多，下面试举部分出版物为例。

例如称“孔庙”的有：曲英杰著《孔庙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李芸撰《孔庙与儒学的传播》（《四川文物》1998年1期），范小平撰《中国孔庙在儒学传播中的历史地位》（《四川文物》1998年6期），彭蓉著《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骆承烈撰《儒家文化的精神家园——孔庙》（《孔子研究》2007年第2期）。

称“文庙”的出版物也不少，例如：许儒慧著《云南文庙》（民族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赵廷光主编《云南文庙存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廖国强撰《文庙与云南文化》（《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卜保怡撰《昆明文庙的兴衰》（收入《五华变迁史话》2009年10月版），刘新编著《儒学建筑文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7月版）。

历史上遍布中华大地的文庙，几乎不姓“文”，就姓“孔”，“文庙”与“孔庙”混用其实古已有之。如果把两种称谓统一为一种，只称“文庙”或只称“孔庙”行吗？这仍然是混乱，因为两个名称，各有所指，既不能随意互换，也不能统称。原因何在？

现代有专家提出历代的文庙（孔庙），有的只有祭祀功用，有的还有其他功用，如按功用分，可把文庙分为几种类型。

有人认为，所有文庙（孔庙）可分为四类：一是曲阜本庙，二是散见于各地的孔子后裔所建的家庙，三是京师孔庙，四是地方孔庙。

也有人认为，所有文庙（孔庙）只需分为家庙与学庙两类即可。

笔者认为，把文庙（孔庙）按其性质分为三类更为恰当。

第一类是孔氏家庙。最早的孔氏家庙，即由孔子的旧居改造成的曲阜孔庙。第二座孔氏家庙是宋室南渡后，孔子四十八世孙由

曲阜迁至浙江衢州所建家庙。从此孔氏家族分为南北两宗；家庙，也分为南北两庙。上面将文庙分作四类，是将其中的家庙又分为两类。严格按功用分，家庙只有一类，凡是只祭祀孔氏祖宗的都是家庙，宜称“孔庙”。

二是国庙。全国只有北京文庙和曲阜文庙（曲阜其实有两座庙，在国庙的崇圣祠后另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家庙）两座国庙，是封建帝王、地方官员祭祀孔子的专用庙宇。北京文庙祭祀人员往往是皇帝本人或朝廷主要官员。北京文庙也是最高级别的学庙——国子监所在地，又称太学。

三是学庙。学庙建于全国各地，也称庙学、学宫，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也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它由地方主管教育的官员管理。

国庙和学庙除了办学校和祭孔子外，还兼祭其他先贤、先儒、乡贤与名宦。

笔者认为按照文庙的功用来称呼，本文上面所列专著和专题论文，所称“孔庙”其实都应该叫“文庙”才名副其实。

鉴于上述国内文庙名称的普遍混乱状况，所以必须给文庙“正名”。

孔庙之名因庙内祭祀孔子而得，故古代又称“孔子庙”，“文庙”之名则源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此，天下读书人皆尊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文庙”即“文宣王庙”的简称。文庙得名的另一因素是，明朝永乐年间，因天下皆拜关公，并将祭祀关武帝的武庙（又称关帝庙）多建于文庙旁，民间就把与武圣人并列的文圣人孔子的庙，称为“文庙”。

把“文庙”与“孔氏家庙”混为一谈，古已有之，而且某些学者对此已有异议，《明史》云：“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阙里家庙，宜正父子，以叙彝伦。”此论以是“传道”，还

是“正父子，以叙彝伦”来区别“文庙”，与“孔庙”（“阙里家庙”），可谓界线分明。然而，至今人们对此仍未认真加以区别。

国庙和学庙与孔氏家庙功能不同，两者不仅是祭祀孔子一人的祠堂，也是供奉其弟子和孟子等儒学代表人物的殿堂，故历史上即有“孔孟之道”的概念，正是孟子的重民轻君思想，让儒学更具现代意识。另外，国庙和学庙还是传播儒家文化的“学宫”，地方的最高教育机构均设于文庙内。

由于国内对“文庙”与“孔氏家庙”两者的概念模糊，已引起误读，还影响了对外翻译。

“孔庙”目前“在对外翻译中，（已被）一律译为‘孔子的庙’即‘Confucian Temple’。”

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若孔圣在天有灵，对祭祀他老人家的庙堂称谓居然长期如此混乱，该是早已看不顺眼。所以笔者认为对古代传承儒学的载体——文庙，早就该效法孔夫子，为其“正名”了。

笔者“正名”的结论是：除孔氏家庙宜称“孔庙”外，国庙和学庙都应该统称“文庙”。

三、文庙的儒学传播和生员培养

文庙与儒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自唐贞观四年（1630）以来，从京师到全国州县大多建有文庙。之后各地的政府都在文庙里设有学堂，所以文庙又叫学宫，这些学堂无论行政级别高低都叫学宫，县有县学，州有州学，府有府学，国有太学。明代学宫内“府设教授，州设学政，县设教谕，皆设训导佐之”，文庙（学宫）就是培养生员最重要的场所。

生员的种类很多，但主要有“三生”“五贡”两大类。

何谓三生？指的是廩生、增生、附生。廩生的全称为廩膳生，